

驯化技术·激活传统： 川剧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动力机制与创新路径

玛依娜·阿得力别克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川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传承，依赖于文化认同的内在驱动、社会价值的多元激励与审美机制的动态更新。在此基础上，传承过程中暴露出生态结构失衡、代际断裂、实践认知偏差及产业融合受限等深层难题。有效路径在于推动传统认知的现代重构，建立分层有序的传承体系，完善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通过科技、文旅、IP 开发等方式实现融合发展。川剧的当代表达正呈现出从符号性保护向系统性重构的转向，揭示出非遗活态传承的时代逻辑与方法论支撑。

关键词：川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传承；动力机制；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J825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川剧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不仅承载了巴蜀地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与审美特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川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文化发展、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国家层面出台《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21）》《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等法规，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习近平总书记 2024 年在《求是》上进一步发文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1]与此同时，2024 年川渝两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川剧与科技应用深度融合，加强川剧文献档案、剧目表演、声腔曲牌、影音资料等数字化建设，支持建立川剧数字博物馆、川剧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共享交流网络平台，开展数字化保护与传承。”^[2]川剧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推动新时代川剧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对川渝两地人民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留存，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

然而，当前川剧非遗的活态化传承正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首先，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川剧的传统传承生态结构发生显著改变，传统剧场空间的式微与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直接导致观演群体萎缩；其次，传承主体呈现明显的代际断层，掌握核心技艺的老艺术家年龄普遍偏大，青年传承人难以形成稳定的人才梯队；此外，数字媒体与传统戏曲传播方式

之间存在显著矛盾,新媒体虽然为川剧提供了全新传播渠道,但也带来了内容碎片化、审美浅表化等新问题,使川剧面临“媒介转换”的挑战。

因此,在当代文化生态中,如何有效激发川剧非遗的内生动力与传承活力,已成为当前学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驯化技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理论构想,即通过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新媒体传播方式、文化产业融合等创新手段,使之与传统文化元素实现有机融合,从而推动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的活态传承与创造性发展。本研究拟从文化认同、价值共鸣、审美创造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川剧非遗传承的内在驱动力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新技术环境下激活川剧活态传承的有效路径与策略,以期对相关领域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参考。

二、川剧类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动力机制

(一) 文化认同驱动机制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3]文化认同也是地方传统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内生动力,川剧以其浓郁的地方性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巴蜀地区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支撑。川剧根植于巴蜀地域文化土壤,形成了富有地方色彩的唱腔、语言、仪式和人物形象,这些文化元素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强化了地方群体的文化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以传统折子戏《拾玉镯》《打金枝》为例,剧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与丰富的方言韵味,生动展现了地方社会伦理与风土人情,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能强烈感受到共同的地域文化记忆,进而巩固和延续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凝聚。

与此同时,川剧特有的艺术符号如变脸、喷火、高腔、胡琴等,已成为巴蜀文化的标志性象征,并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不断得到再现与强化。这些符号不仅承载着地域的艺术传统,更通过生动的舞台呈现和仪式化传播,持续巩固了川剧在地方群体心中的文化地位。著名川剧艺术家沈铁梅以其精湛技艺与丰富的艺术实践,演绎了《李亚仙》《江姐》等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作品,不断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社会对川剧的自豪感与文化认同。她的表演成为连接传统艺术与现代观众情感的桥梁,推动了地方社会对川剧艺术的文化自觉与积极参与,形成了川剧活态化传承的坚实基础。

此外,川剧艺术还在社区、学校、剧场等不同社会空间内持续得到推广与传播,通过这些文化实践,不同年龄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得以深入接触并了解地方戏曲艺术,进而逐步建立起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文化认同机制,使川剧始终能够在地方社会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维系地域文化记忆与推动非遗传承的重要精神动力。

(二) 价值共鸣激励机制

“戏曲艺术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教化民众、传播道德观念的重要使命,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4]川剧的持续活态传承不仅依赖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机制,也深深植根于其蕴含的多元价值共鸣。首先,川剧通过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发挥着显著的道

德教化作用。传统戏曲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鲜明的劝诫伦理与社会教化功能，川剧亦然。如川剧经典剧目《白蛇传》《目连救母》等，以曲折动人的情节与道德化的叙事方式，向观众传递忠孝、诚信、善恶有报等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观众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道德行为。这种教化功能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体现了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社会价值。

其次，川剧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背景下，为观众提供了情感释放与精神寄托的重要空间。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民间票友团体、地方文化活动中，川剧演出活动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更成为当地群众交流互动的公共平台。通过长期的观赏、交流与互动，川剧凝聚了不同年龄与职业群体的情感与共识，形成一种精神上的集体仪式，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

此外，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川剧的价值共鸣机制也得到显著体现。例如，沈铁梅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演出，使川剧跨越了语言文化壁垒，在海外观众中成功实现文化传播与价值对话。这种跨文化交流不仅扩大了川剧的社会影响力，也增强了国内外观众对川剧艺术所承载价值的广泛认同，使川剧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获得积极反馈与激励。

（三）审美创新推动机制

审美创新是川剧艺术活态化传承的关键动力之一。川剧艺术历来以其丰富的表演形式与多样化的美学风格而著称，独特的审美品格使其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独树一帜。川剧表演融合了诙谐幽默与悲剧力量，并以变脸、吐火等技艺增强戏剧张力；音乐方面融合了高腔、昆腔、胡琴、弹戏和灯调等多种声腔，风格多样、韵味独特，表现出显著的审美创新性。

近年来，川剧艺术积极回应时代审美的变化，通过内容创新和形式变革不断拓展自身的表现力。新编剧目如《草鞋县令》以现代审美视角和表达形式重新演绎历史故事，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获得良好社会反响。同时，舞台美术设计中也融入现代元素，包括服装、布景和灯光的现代化改造，使川剧传统程式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

川剧还积极探索新媒体传播形式，通过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互动、短视频传播等方式，将传统戏曲带入年轻观众视野，成功拓展了艺术传播的途径。这种审美创新与时代审美的有效互动，使川剧艺术不断焕发新活力，推动了川剧非遗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川剧艺术的文化认同机制、价值共鸣机制与审美创新机制三者共同作用，构筑了川剧非遗活态化传承的综合动力体系，确保了川剧在新时代文化生态中持续焕发活力、行稳致远。

三、川剧类非遗活态化传承的现实困境

（一）传承生态结构失衡

川剧作为地方戏曲，其传承依赖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然而当代川剧传承生态出现明显失衡。一方面，传统戏曲演出空间日渐萎缩，茶馆、戏院等传统舞台在城市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中式微；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渠道虽蓬勃兴起，却未能与川剧传承实现有效接轨，形成了演出空间与数字传播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大量川剧艺术未能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触达年轻一代观众，传统表演艺术与现代传播手段之间缺乏有机融合，致使川剧的传播受众局限在老一辈戏迷或特定圈层。

与此同时，城乡与区域间的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失衡。在城市，剧团与艺术院校相对集中，政府投入与媒体关注较多，川剧在都市有一定展示平台；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部分偏远区域，川剧演出机会稀少，基层传承网络薄弱，青年群体接触川剧的渠道更为有限。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川剧传承机制受到系统性制约，文化资源和传承机会更多地累积于中心城市，而传统上孕育川剧的基层社区却逐渐失去活力和参与度。此外，各地区川剧发展不平衡，一些川剧流派或地方剧种因所在区域缺乏支持而陷入衰微，进一步削弱了川剧传承的整体生态。传承生态结构的失衡对川剧活态传承路径的形成构成了实质阻力。传统演出空间与新媒体渠道脱节，意味着川剧无法顺畅融入当代主流传播环境，难以培养新的观众和从业者；城乡与区域资源失衡则导致传承链条在空间和社会基础上断裂，难以形成覆盖广泛人群的传承网络。长此以往，川剧传承生态中“木桶短板”效应凸显，任一关键环节的薄弱都会制约整体传承效能。因此，只有弥合演出空间与新媒体传播的结构裂痕，均衡配置城乡区域文化资源，才能重建良性的传承生态，为川剧的活态化传承夯实基础。

（二）传承主体代际断裂

川剧表演艺术的传承高度依赖个人技艺的口传心授，然而当前川剧传承主体正面临严峻的代际断裂危机。老一辈艺术家逐渐凋零且平均年龄不断增高，而新生代接班人却匮乏无几。许多德高望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们身怀的独门技艺和宝贵经验急需后继有人。然而在青年群体中，投身川剧事业的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相较于现代文娱行业，传统戏曲职业回报率低、训练艰苦漫长，导致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社会知名度和受众基础的下降使得青年看不到川剧行业的广阔前景，难以产生投入毕生精力传承艺术的意愿。结果便是川剧人才呈现“青黄不接”的断层态势。这一代际断层直接导致川剧传统技艺传承链条出现“断档”。在一些流派和技艺上，师徒相承的谱系中断，许多经典剧目和绝技面临无人可学、后继乏人的境地。即便部分艺术院校设有川剧表演专业，也因为生源有限或毕业生改行等问题，难以真正扭转人才流失的局面。传承主体的老龄化与后备力量匮乏，使珍贵的表演程式、唱腔和身段等面临失传风险，传统舞台艺术的生命力被严重削弱。

传承主体的代际断裂对川剧发展构成了根本性威胁。作为活态艺术，川剧的延续需要源

源不断的新人投入，唯有人在舞台上“活态”表演，传统才得以真正存续。一旦传承人链条中断，哪怕物质资料和影像记录保存再完善，也无法替代活生生的艺术生命力。青年从业者的缺失意味着川剧后继无人，艺术创新与发展后劲不足。可以说，人才断层是川剧传承中最致命的隐患，它动摇了川剧未来发展的根基。只有设法激发年轻一代投身川剧的热情，通过政策扶持、教育培养和提高社会认同等方式，才能缓解代际断裂的困局，为川剧艺术的薪火相传注入持久动力。

（三）保护与传承实践中的认知偏差

当下川剧非遗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阻碍了科学有效的传承。首先，“名录中心主义”倾向突出，许多地方过度重视将川剧项目列入各级非遗名录，把申报成功视为保护工作的终点，而忽视了名录之后的后续活态保护。这种只见名录、不见传承的做法，导致川剧进入名录后反而缺乏持续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形式重于实效的问题。其次，功利化倾向盛行，部分主体将川剧当作博眼球、促旅游的工具，急于通过商业演出和文化包装获取经济利益。为迎合市场，一些剧目被片面改编、过度娱乐化，传统艺术的审美意蕴被削弱，川剧沦为噱头式的表演，背离了其文化本真。

此外，还存在对“原生态”的片面追求与庸俗化开发的偏差。一方面，过度“原生态化”表现为有人片面强调川剧必须保持所谓原汁原味的形态，不允许根据时代环境进行创新调整，仿佛任何现代元素介入都是对传统的不忠。这种僵化思维使川剧难以融入当代生活圈层，保护工作流于把艺术隔离于博物馆式的静态呈现。另一方面，庸俗化问题在某些传承实践中屡见不鲜：为追求迎合大众的即时效果，川剧表演被粗浅化、碎片化，传统技艺被简单拼接甚至戏谑化，文化品位下降，观众难以领略川剧深厚的艺术价值。

上述认知偏差严重削弱了川剧非遗保护传承的成效。名录至上的心态使保护停留在纸面，功利驱动和庸俗化导致传承变形走样，而过度原生态思维又束缚了川剧的当代活力。纠正这些误区，需要将科学保护理念与生活化传承实践有机融合。所谓科学保护逻辑，就是以川剧艺术自身规律为依据，制定系统的传承策略和评价机制，既重视保存原真性，又允许在保持核心价值前提下合理创新。生活化传承则强调让川剧走进现代生活，通过现代教育、社区文化活动、新媒体传播等途径，使川剧融入大众日常，让人们在生活场景中接触和喜爱川剧。只有理论指导与实践融通，摒弃功利浮躁之心、避免固步自封，才能实现川剧非遗保护的良性循环，在现代社会中延续其独特的艺术生命。

（四）产业化转化瓶颈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川剧艺术的现代转化与产业化发展，是一道亟待破解的课题。川剧作为高雅传统艺术，蕴含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内涵，其产业化开发必须建立在不损害艺术本体价值的前提下。然而现实中，川剧产业化过程中在产品形态、产业协同与文化逻辑之间存在显著矛盾与张力，这成为制约其深入转化的瓶颈。

首先，产品形态转换的矛盾。传统川剧以舞台剧目为主要载体，时长较长、节奏缓慢、

语言唱腔具有地域性，这些特征与当代快节奏、多元化的文化消费习惯存在冲突。为了迎合市场，川剧被迫缩短剧目、加入现代元素甚至改编为新媒介形式，但过度的形式改变可能稀释川剧的精髓；坚持传统形态则面临吸引力不足的困境。如何在保持川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以观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形式呈现，成为一道难题。

其次，产业协同方面的张力。川剧的传承发展涉及演出、教育、旅游、影视等多个领域，但目前相关产业链协同不足，各部门和行业缺乏统一规划与合作，导致川剧产业化项目零散、规模有限。即使尝试跨界合作，也因各方诉求不同（商业资本追求效益而文化工作者注重品质），磨合困难，难以形成合力。

最后，文化逻辑与市场逻辑冲突。川剧传承有其内在文化规律，如师承关系、戏班体制和社区审美习惯等，而市场逻辑讲求效率、规模和利润。二者若无法调适平衡，产业化就难以持久。市场往往要求标准化批量生产、追逐速成热点，而川剧艺术强调个性差异与精雕细琢的长期积累。这种价值取向的错位使川剧产业化陷入“两难”：要么因坚守文化脉络而商业表现不佳，要么为迎合市场而削弱文化内涵。

上述矛盾与张力叠加作用，使川剧艺术的产业化转化步履维艰。然而，产业化并非不可为，关键在于找准正确的转化逻辑。核心是树立文化生态整体性理念，以整体性保护与开发思维统筹川剧的产业实践。也就是说，在尊重川剧艺术规律和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协调各方力量，营造有利于川剧发展的整体生态环境：既有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保障传承，也以市场运作为艺术赋能拓展受众渠道，并通过教育和社区参与确保传承根基不断。只有将川剧置于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统筹转化，避免碎片化、功利化开发，才能在保持艺术本真的同时，实现产业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以文化生态整体性为依归，川剧的产业化之路才能走得稳健而长远。

四、川剧类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创新路径

（一）活态传认知知的重塑

活态传承强调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动态呈现与持续再生。因此，推动川剧非遗活态化传承，首先应实现观念层面的根本性转变，即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创新。具体而言，在剧目内容创新方面，传统川剧剧目大多源于古典文学或民间故事，因其冗长复杂，难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和观演习惯。对此，川剧团体应以传承精华、革新形式为原则，对经典剧目进行合理取舍和再创作，例如传统川剧《玉簪记》通过精编和情节的现代化重构，不仅增强了艺术观赏性，也有效拓展了年轻观众的接受度，达到了传统内容的现代再生。

其次，在表现形式上，应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川剧特有的唱念做打、变脸绝技等传统程式固然不可或缺，但在舞台呈现方式上，须积极采用当代舞台美术、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进行创意表达。例如，引入LED影像、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丰富舞台表现层次，拓展观众的视觉感知，推动川剧艺术在新媒介环境下焕发新生。这种艺术创新与

传统程式的平衡，不仅能够彰显川剧艺术的当代价值，更能增强其对新时代观众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再次，在传播方式的创新方面，须充分利用新媒体与数字化传播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传播生态。具体而言，各川剧院团可以利用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开展线上互动直播，增加观众对川剧的体验感；同时通过短视频、微纪录片、剧目讲解等形式，激发年轻群体的兴趣。例如，成都川剧院成功运用短视频平台进行川剧片段推广，使经典剧目与网络热点相结合，极大提升了川剧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播效能。通过这种多渠道、立体化的传播布局，实现川剧艺术与现代媒介的有机融合，推动传统戏曲在当代社会的有效再生与价值增值。

（二）传承人培养体系的优化

川剧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需通过政策引导、院团实践和院校教育三位一体的方式，形成多层次、全链条的传承人培养机制。

在政策引导方面，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加强川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首要就是完善法制体系，夯实法治建设基础。……各级地方政府应提高对川剧保护传承的重视程度，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5]通过立法和财政专项资金，为川剧传承人提供稳定的生存环境和政策保障，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缓解川剧人才队伍生存压力。

其次，在院团实践层面，应充分发挥戏曲院团“传帮带”的功能。建立并完善名师传艺制度，由资深表演艺术家定期对年轻演员进行指导和带教，以师徒制、名家工作室的方式，确保技艺精髓的代际传承。比如川剧表演艺术家肖德美通过师带徒的模式，成功培养出了一批川剧新秀，为川剧艺术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实践经验。

此外，院校教育体系的优化不可或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应建立川剧艺术教育的系统化培养链条。小学和中学阶段通过开设川剧艺术欣赏课、表演实践课，引导青少年对川剧艺术的兴趣；高等院校则须强化川剧专业课程建设，融合传统表演训练与现代化舞台表现形式的教育内容，培养兼具传统技艺和现代传播意识的综合性人才。川剧表演与数字媒体传播的跨界课程开发，正逐步成为戏曲类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有效尝试。

（三）多元协同保护机制的完善

川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非单一领域或部门所能独立完成任务，而是一项涵盖政策制定、文化实践、知识生成与社会动员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面对活态化传承所要求的“动态性—开放性—嵌入性”保护逻辑，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保护治理体系，已成为提升川剧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首先，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与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应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建构职能。一方面，需明确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职能边界与协作机制，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衔接的政策支持网络；另一方面，应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非遗传承人补助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嵌入川剧内容，形成“政策—财政—服务”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应引导地方文化治理将川剧保护纳入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提升其制度性嵌入程度。

其次，行业组织、文艺院团与学术机构应在各自优势领域形成合力。行业组织可统筹资源整合与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与市场主体参与非遗演出、衍生品开发等工作；川剧院团作为艺术生产和演出实践的主体，应创新剧目样态、优化人才结构，同时在社区、校园、文化馆等场域展开日常化、生活化演出，实现非遗表演由“专业剧场”向“社会空间”的拓展；学术机构则可通过开展文化人类学、艺术学、传播学等视角下的多学科研究，提出科学的保护策略与传播路径，为非遗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再次，社会组织与民间力量是提升保护机制韧性与细腻度的重要支撑。在多数基层场域，社区文艺协会、民间剧团、非遗爱好者群体自发组织的小型川剧表演、戏曲讲堂、脸谱绘制等活动，不仅拓展了川剧的传承路径，也显著提升了民众对地方文化的情感认同。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形式弥补了政府主导路径下“行政性保护”可能存在的空白与迟滞，使川剧在日常生活层面得以自然嵌入并持续生长。

（四）融合发展新模式的探索

随着媒介环境演化与文化消费结构升级，川剧非遗活态化传承面临着接受场域碎片化、受众代际更替等现实挑战。为了打破传统戏曲艺术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结构性隔阂，探索跨界融合的新发展模式，成为川剧非遗现代转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围绕“川剧+科技”“川剧+文旅”“川剧+IP 开发”“川剧+网络平台”的融合路径初具雏形，展现出较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川剧+科技”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单一空间结构，推动川剧走向技术驱动的多元媒介表达。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的引入，川剧的表演方式从线性叙事转向沉浸式体验，不仅拓展了舞台表现力，也增强了与年轻观众的情感连接。“比如，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对《红楼梦》的故事加以场景化切分，以八个主要故事进行呈现，并设计制作了三生石畔、荣国府、沁芳桥等舞台表演的三维场景模型，将真人演员的表演与舞美共同合成在虚拟空间中，观众可借助交互工具进行自主体验。”^[6]

“川剧+文旅”路径使川剧在地方文化品牌建构中实现功能拓展。川剧元素被嵌入文旅街区、主题景区与非遗体验基地，实现“演出—观光—体验”一体化。在成都锦里、宽窄巷子等地，游客不仅可以观看变脸表演，还可参与脸谱彩绘、戏服试穿等互动项目，使川剧从“舞台艺术”转化为“在地文化”，增强了非遗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与可接近性。

“川剧+IP 开发”则通过视觉符号转化与产品形态重构，将川剧文化资源导入当代消费市场。变脸技艺、人物形象、唱腔元素等成为文创设计的重要母题，广泛应用于文具、玩具、服饰等衍生品开发中。例如，某川剧院开发的变脸遥控公仔不仅受儿童喜爱，还成为地域文化输出的载体。这种 IP 化路径提升了川剧的市场辨识度，也拓宽了其社会功能与经济边界。

“川剧+网络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传播逻辑的重塑。借助短视频、直播、弹幕互动等新媒体形式，川剧实现了从剧场演出到个体用户的直达传播。年轻演员通过抖音、B 站等平台分享川剧唱段与幕后花絮，构建起网络戏迷社群。这种平台化传播方式，不仅降低了文化接

触门槛，也促进了川剧在非线性、去中心的媒介环境中的流动与再生。

五、结论

川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传承不仅关乎传统艺术形式的延续，更深层关联着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以及文化生态的动态再生。从内在动力机制的演化，到现实困境的深度剖析，再到创新路径的多维探索，可以看出川剧传承已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再现问题，而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技术与制度的综合性议题。唯有在尊重其文化本体的基础上，激活内生机制，重塑外部结构，方能实现非遗由“静态保存”向“动态再造”的根本跃迁。川剧作为兼具艺术高度与地域深度的传统戏曲样式，其活态化发展路径所体现的融合逻辑与系统思维，亦为其他非遗形态的当代表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样本。未来，如何在全社会层面构建起更具开放性、协同性与韧性的非遗传承机制，仍是需要持续关注与深入推进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求是, 2024(8): 4-13.
- [2] 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N]. 四川日报, 2024-08-02(007).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85.
- [4] 廖奔. 中国戏曲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5] 牟元义. 法治视角下川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研究[J]. 戏剧文学, 2025, (03): 4-10.
- [6] 潇婧, 李时潮. 有限与无限数字赋能的控制与自由：戏曲数字化的多重可能与挑战[J]. 四川戏剧, 2025, (03): 18-24.

Domestication technology activates traditi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path of living inheritance of Sichuan Oper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yina Adelibieke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Sichuan Oper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lies on the intrinsic dr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diversified incentives of social value, and the dynamic updating of aesthetic mechanisms. However, during this process, deep-seated issues such as ecological imbalance, generational gaps, cognitive biases in practice, and limite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ve emerged. Effective solutions include moderniz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establishing a hierarchical and orderly inheritance system, improving a multi-faceted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y, cultural tourism, and IP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expressions of Sichuan Opera are shifting from symbolic protection to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revealing the contemporary logic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Sichuan Oper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inheritance; dynamic mechanism; innovation path